

仅供内部学习交流使用

理论宣传月报

2018 年第 1 期 总第 100 期

厦门大学党委宣传部 编印

2018 年 1 月

目 录

2017 年理论热点专题

2017 年最具价值的 100 个观点	1
2017 年理论视野中的 10 大热点	31

2017 年最具价值的 100 个观点

来源：《人民论坛》 2018 年 1 月 2 日

前 言

磅礴的时代足以书写华彩的篇章，2017 年注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这一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全国展开，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取得新进展；这一年，雄安新区横空出世，“千年大计”引发无限遐想；这一年，全球政党大会在中国召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在推进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思想理论界风云激荡，精彩纷呈，各种新观点、新思想喷涌而出，交相争辉，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展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辉煌气象。

这 100 个观点分为以下几部分：来自于总书记的 10 个观点；来自于十九大的 10 个观点；来自于理论界的 70 个观点，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类别；来自于海外人士的 10 个观点。

2017 年度的 100 个观点呈现出一些鲜明特征：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党心民心为之一振。“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将改革进行到底”等高瞻远瞩、铿锵有力的论断，展现了大国领袖的公仆精神、民生情怀，成为伟大时代的最强音，党的理论创新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引领力量。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新论断、新举措、新战略，获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肯定。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到新时代“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重大政治论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道路，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满怀憧憬，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焕发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与巨大感召力。

思想理论界表现活跃、生机勃勃，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深远程度前所未有。各领域专家

学者围绕全面依法治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扶贫，科技创新，住房、教育、医疗改革等社会焦点问题各抒己见，大胆发声。各种观点、各种思想争奇斗艳，展现了思考的广度与深度，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有益镜鉴。

海外舆论评价更加积极正面，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国际话语权大幅提升。“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海外政要、专家给予了充分认可，并纷纷建言。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切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充满期待。

来自于总书记的 10 个观点

1.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中国人民深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艰辛，对各国人民取得的发展成就都点赞，都为他们祝福，都希望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不会犯“红眼病”，不会抱怨他人从中国发展中得到了巨大机遇和丰厚回报。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 年 1 月 17 日）

2.撸起袖子加油干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闻鸡起舞，登高望远，撸起袖子加油干，继续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进发，继续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发，继续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进发，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书写 13 亿多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在 2017 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2017 年 1 月 26 日）

3.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

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越是超大城市，管理越要精细。北京要探索构建超大城市治理体系，这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北京提出的要求。背街小巷是最能体现精细化管理水平的，城市管理要向街巷胡同延伸。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管，光靠政府力量不够。北京有自己的好传统，如“朝阳群众”、“西城大妈”，哪里多一些红袖章，哪里就多一份安全、多一份安心。——在视察北京时强调（2017 年 3 月 24 日）

4. “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

“一带一路”建设根植于历史，但面向未来。古丝绸之路凝聚了先辈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促进了亚欧大陆各国互联互通，推动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完全可以从古丝绸之路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本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进合作，共同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它以亚欧大陆为重点，向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开放，不排除、也不针对任何一方。——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2017年5月15日）

5. 打扶贫攻坚战的关键是人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尤其要加强工作第一线的组织领导。打攻坚战的关键是人，这些年我们在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有的还增加了大学生村官。深度贫困是坚中之坚，打这样的仗，就要派最能打的人，各地要在这个问题上大下功夫。否则，有钱也不成事。——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2017年6月23日）

6. 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果，人民群众给予了很高评价，成绩值得充分肯定，经验值得深入总结。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盲目乐观。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全党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2017年7月26日）

7. 将改革进行到底

改革是我们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狠抓改革落实，必须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和运用。要

继续高举改革旗帜，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坚定改革定力，增强改革勇气，总结运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改革新经验，再接再厉，久久为功，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八次会议上强调（2017年8月29日）

8.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2018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4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生活实现了小康，逐步富裕起来了。我们将总结经验、乘势而上，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不移深化各方面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使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我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2017年10月25日）

9.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我说过，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17年12月1日）

1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摆摆表现，找找差距，抓住主要矛盾，特别要针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在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要力戒形式主义，以好的作风确保好的效果。——就文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作出重要指示（2017年12月11日）

来自于十九大的 10 个观点

1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12.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4.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15.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6.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17.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18.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

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19.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20.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来自于理论界的 70 个观点

政治类

21.黄坤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显示出强大生命力，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做到既不忘老祖宗、又讲出新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战略和战术相一致，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是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人民日报》，2017 年 12 月 20 日）

22.曲青山：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时刻担负了重要责任，在关键时候起了关键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以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襟和气魄，以一个大国领袖的气度和风范，以爱民为民的历史责任担当，以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在重要的时刻担负了重要责任，在关键的时候起了关键作用，展示了治国理政的雄才大略。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领袖人物也对历史产生着重要作用。这个作用的具体表现就是顺应时代潮流、代表人民意愿，对历史发展起着加速的推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当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正是起了这样一个不可替代的重大关键作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求是》，2017 年第 16 期）

23.王伟光：只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势不可挡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前方还有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需要全党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伟大复兴中国梦有机统一、不可分割。只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我们党始终先进、始终纯洁、始终坚强有力，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可能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纪检监察》，2017 年第 21 期）

24.李君如：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是统一的

关于新矛盾的概括，实际上是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所呈现出来的新的阶段性特征。这样，就可以把“变”和“不变”统一起来。我们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强调“变”，但是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去追求美好生活；另一种倾向是强调“不变”，不思进取，不能按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去探索去创新。——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前线》，2017 年第 11 期）

25.马建堂：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有机整体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破解发展约束，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需要。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要思想，是新阶段经济发展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如何认识新阶段经济、如何发展新阶段经济、如何解决新阶段经济中突出矛盾的系统认识，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性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学习时报》，2017年5月8日）

26.许耀桐：政治建设发展的动力在于改革

政治建设发展的动力在于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政治建设发展。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是一个周期，1978年成了中国的“改革元年”的话，那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则是改革的又一个新周期，2014年成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全面深化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动的。全面深化改革是民众的期盼、社会的需求，更是执政党的使命，领导者的职责。——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党政研究》，2017年第6期）

27.韩震：全局性系统性的改革策略才能适应新时代新需求

在新时代继续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意味着过去的改革是“片面的”“局部的”，而是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现阶段，应当以更加全面的视角，提出更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的策略，才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小康社会时我们主要关注经济目标，到比较全面地关注小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协同发展的目标，这个进程本身就反映了社会进程与社会认识、社会问题与解决社会问题是一同发展的。这个发展进程从局部启动、重点突破、以点带面，进入现在更加协调、更加包容、更加公正、更加绿色的阶段。——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北京日报》，2017年11月27日）

28.韩庆祥：让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形成合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思想精髓或本质要义，主要就是注重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正确发挥及其协调并形成合力。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新机遇、新挑战，需要我们做出新回答，展现新作为。这就需要

我们在政治层面注重发挥党政主导力量，又要在经济层面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还要在社会层面挖掘出蕴含在人民群众中的磅礴伟力，使这三种力量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合力。——中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副教育长（《人民论坛》，2017年12月上）

29.贾立政：习近平总书记的认识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治国理念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光辉典范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国化开辟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境界，为我们党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哲学基础。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每一次认识论上的重大飞跃，都实现了其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每一次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都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无不以认识和认识论上的重大飞跃为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的认识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治国理念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光辉典范，十九大报告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现重大创新突破。——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人民论坛》，2017年11月上）

30.薛澜：“决策删简—执行协商”模式适应于现阶段的中国公共政策治理环境

转型期中国公共政策过程呈现新的特征：政策制定环节被删简，政策执行作为决策补充而表现为权衡与协商的过程。“决策删简—执行协商”作为灵活的过程模式，是在当前中国大量政策议题涌现情形下塑造出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政府依赖决策删简机制，能够有效化解决策中面临的社会压力与多元利益，提升政府公共决策和应对外界压力的能力；在执行协商机制下，政策方案逐步细化，利益冲突被内化解决，整体上可以保障深化改革的向前推进和政府治理的系统稳定。因此，这种模式适应于现阶段的中国公共政策治理环境，有助于推进部分领域的政策改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31.颜晓峰：政治能力是领导干部的第一能力

政治能力是领导干部的第一能力，是履职尽责的牢固根基。一些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说到底，是由于政治定力不够、政治意识淡化。新形势下，党领导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波澜壮阔，勇于破除国内国际、党内党外的重大障碍。面对复杂形势、深层矛盾、突出问题，领导干部只有具备高度的政治意识、高超的政治能力，才能够驾驭方向、掌控大局、破解难题、实现目标。政治能力不强，就会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丢掉原则、失去底线，导致弊病丛生、人心涣散。——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天津日报》，2017年4月17日）

32.邓纯东：党内监督发挥着内因的决定性作用，绝不是“左手监督右手”

有人把纪检监察部门和其他职能部门比喻成左右手，认为党内监督是“左手监督右手”，归根结底是自己监督自己，没有威慑力，不彻底。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起决定性作用；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条件，起辅助性作用。因此，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关键在于发挥内因的决定性作用，紧紧抓住党内监督这一中心环节。从现实情况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监督绝不是走形式，而是动真格的。正是因为党内监督持续发力，政治生态才得以不断净化，“不敢腐”氛围才日趋浓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民日报》，2017年3月27日）

33.石仲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是由“四个伟大”的有机统一决定的

“四个伟大”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离开建设伟大工程，就不可能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以更大力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新形势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好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人民日报》，2017年8月24日）

34.胡鞍钢：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文化和绿色生态四要素共同构成支撑起道路自信的支柱

现代化是目标，作为长期处于人类文明佼佼者地位的中国，只有实现全面的现代化才能称之为民族复兴；社会主义是路径，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确保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国家的稳定统一；中国文化是根基，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不忘初心、继往开来；绿色生态是原则，只有走生态文明之路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前线》，2017年第6期）

35.张维为：中国“选拔+选举”的模式完全可以和西方选举模式竞争

在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尽可能卓越的领导人。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它在很

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保底的“下下策”的结合，这是超越西方那种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北京日报》，2017年11月27日）

36.房宁：中国民主政治模式终结“历史终结论”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在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的深刻影响下，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长期奋斗和探索中，形成了既体现民主政治基本价值和普遍原则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中国的探索丰富了人类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提供了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方案。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扬弃，是一种伟大的制度创新。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参考消息》，2017年9月26日）

37.何亚非：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思想契合世界需求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虽然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但并没有让各国人民普遍受益，反而使国家间和一些国家内部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失衡、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当前，如何引导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各国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迫切要求，中国提出了旨在推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全球经济治理思想。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思想既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因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欢迎。——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人民日报》，2017年7月20日）

38.阎学通：反建制主义思潮形成的原因并非国别性的，而可能是全球性的

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使两极分化问题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同时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两极分化都十分严重。此外，全球化的负面作用不断扩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遭受的伤害大于收益。全球化的负面作用给反建制主义兴起创造了社会条件，反全球化、反外来移民、反自由贸易、反对向国际机构让渡主权等思想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些思想都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2期）

39.金灿荣：中国推动的一些新的国际机制将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个诀窍，就是双轮驱动、双引擎，美国是单轮驱动，只有市场。“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正在变化，世界治理的主要平台以后将是 G20，G7 的作用会下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大，由中国推动的一些新的国际机制将会更为重要。比如亚投行、金砖银行、亚信会议、上合组织。另外，“一带一路”倡议，还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伙伴网络”等日后的影响也会更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新华网，2017 年 8 月 4 日）

40.李兴：中国外交表现出大国作为、大国担当、大国胸襟、大国气度、大国贡献

中国的大国外交，不是简单地指大国之间的外交，而是指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要有大国作为、大国担当、大国胸襟、大国气度、大国贡献，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造福世界各国人民。这里造福世界的“公共产品”，既包括安全、经济等“硬实力”，也指规则、制度、理念等“软实力”。中国的大国外交，不搞大国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以强凌弱。中国的大国外交，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战略目标，不在于一时一地的经济得失，不囿于一时一事的成败输赢。——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亚欧研究中心主任（《人民论坛》，2017 年 10 月下）

经济类

41.厉以宁：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包含三个陷阱：发展制度陷阱、社会危机陷阱、技术陷阱。但是中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突破：第一个突破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突破是解放了劳动力。第三个突破是经济特区的建设。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倒退回去。十八大以后各方面的改革都在进行，所以中国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可能的，中国正在变化，而且变化会越来越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经济网，2017 年 7 月 25 日）

42.吴敬琏：去杠杆去产能应由市场主导，行政手段调控经济难成功

借行政手段“去”和“补”将产生“副作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行政机关并没有确定什么是最优经济结构的能力，用行政手段进行“去”和“补”的资源再配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负作用。主要表现就是用行政指标要求“去”和“补”，企业总有办法

绕过这个行政命令。要强调通过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通过市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和再配置，一方面去产能，另一方面补短板。不要政府去指定发展哪个产业，市场自会告诉你需要什么产业，需要什么产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第一财经日报(上海)》，2017年2月19日）

43.刘伟：经济下行和通胀压力均源于供给侧

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生产要素成本全面大幅度提升，核心竞争优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突出表现在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生态环境成本、技术进步成本都大幅度上升。现阶段，面临经济下行和潜在通胀压力同时存在的双重风险。经济下行风险，表面看是由内需疲软导致的，实质是源于供给侧。因为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投资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缺乏升级空间，创新力不足，缺乏优质投资项目。双重风险中的另一重风险即潜在通胀压力上升，这不是需求拉上的通胀压力，而是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其实质也是供给侧出现了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新浪网，2017年4月1日）

44.林毅夫：中国要懂得利用后发优势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能快速发展主要依靠后发优势，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而要实现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就要求企业不断技术创新并且不断地转型升级。发展中国家所谓的科技创新就是在商品生产的时候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就是技术创新，进入的行业的附加价值比现在的附加价值高就是产业升级，不见得要新发明，只要把其他国家用过的成熟技术和产业引进，那就是创新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的话，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北京青年报》，2017年12月11日）

45.刘元春：开启基础性和引领性的制度改革，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度和广度

要通过问题导向的改革调整，逐步触及新常态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和制度性问题，开启基础性和引领性的制度改革，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探索目前各类凸显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二是要探索解决深层问题的各类基础性改革的步骤和可行的方案；三是要将各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基础性引领性改革和机制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建立在坚实的机制和体制基础之上。比如，采取正确方略和有效办法推进五大重点任务，去产能和去杠杆的关键是深化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基础性改革，去库存和补短板的指向要同有序引导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工市民化有机结合起来，降成本的重点是增加劳动力市

场灵活性、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日报》，2017年9月15日）

46.陈文玲：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关键周期会拉长

中国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周期、制造业繁荣的周期会拉长，这将为我国争取持续发展的时间窗口。原来所谓战略机遇期是2000年到2020年，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我们创造的新的战略机遇期就会重新开始。中国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已经40年了。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中国经济到2020年实现GDP增长6.5%没有问题。到2030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再有10年持续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就可以实现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高速增长和中高速增长。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没有过的。中国农业需要现代化，但这不足以支撑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强国。强国之基、立国之本还是制造业。繁荣的制造业周期还是要尽可能拉长。我们在转型升级中，产业迈向中高端已经出现端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北京日报》，2017年12月11日）

47.盘和林：去杠杆与稳增长并非经济的“矛”与“盾”

从国民经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去杠杆与稳增长并不是一维空间，并非“矛”与“盾”的关系，资源优化配置以及结构平衡，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去杠杆甚至对稳增长尤其是长期增长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短期来看，我国宏观经济有很强的韧性，产业之间、新旧动能转化、“双创”等腾挪的空间较大，这为“去杠杆”不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提供了很好保障。长期来看，去杠杆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抓手，也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工具之一。——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首席经济学家（第一财经网，2017年12月4日）

48.周其仁：“中国奇迹”的逻辑与续写奇迹的关键，体制成本至关重要

中国的基本经验不是别的，正是经由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体制成本。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举其大要，破除国家对工业和其他较高收益产业的行政垄断，欢迎外资落地，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解除国际贸易的国家专营，启动汇率改革（特别是主动减除严重的本币高估），持续改革进出口体制，根本改善外贸服务，所有这些改革硬仗，一役也不能少。归结起来，就是把先前几乎无穷高的体制成本大幅度降下来，同时也包括降低中国人接受一切先进技术管理知识的学习成本。在此前提下，中国潜在生产成本优势才开始得到激发，中国出口才开始发力，世界也才得以发现中国经济拥有惊人的比较优势。因此，真实的中国经验是以降体制成本为纲领，

靠改革开放释放出中国在全球市场的比较优势。形势很清楚，以全面深化改革抑制并扭转体制成本重新急升的势头，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产权与中国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

49.姚洋：未来的挑战是劳动力质量不够

我们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是劳动力质量不够。提高年轻一代的教育水平，适应新的时代，是政府应该做的。教育部已经提出来一个目标，要推进普通高中的教育。对于未来，人民生活首先要从勤劳致富转变为适度享受。如何能达到适度享受，首先就是环境保护，至少到2035年，要把环境生态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其次是补充社保，把个人账户做实了，建立起养老账户，建立养老基金，让老百姓自己去投资。再次是城乡一体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青年报》，2017年12月11日）

50.白重恩：企业税费负担重的原因在于社保缴费

其实我们说税负，应该说税费负担，因为在我们国家叫“费”的一些东西，在其他国家也叫“税”。比如说我们的社保缴费，在美国它就是一个税。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看的话，我们企业的税费负担确实是比较重的。我们企业的税的负担并不算重，即使是按照官方的税率，做一下国际的横向比较，它并不是很重的。我们负担比较重的是费，社保缴费是其中负担最重的一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第一财经网，2017年2月15日）

51.黄群慧：扭转“实虚失衡”亟须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

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这些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实体经济供应体系质量不高，影响实体经济供求失衡，实体经济效率逐步降低；大量资本开始“脱实入虚”，或者进入房地产市场炒作，或者在资本市场自我循环，追求在虚拟经济中自我循环，进一步形成资产泡沫，随着泡沫的愈来愈大，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最终形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失衡。“脱实向虚”问题表明，实体经济供给与金融供给之间、实体经济供给与房地产供给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即“实虚失衡”。这种“脱实入虚”的失衡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资产泡沫会越来越大，最终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甚至会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停滞不前。基于此，必须实现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提升，方能扭转“实虚失衡”。——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参考报》，2017年2月13日）

52.匡贤明：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和计划经济挂上钩，是对新经济的误解，也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

即使把过去所有的数据全部交给了人工智能，它也很难知道下一秒钟所有消费者的偏好、所有生产者的决策、所有企业家对风险的判断和把握。因此，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和计划经济挂上钩，是对新经济的误解，也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更重要的是，也容易忽视当前发展数字经济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过程中，新经济领域还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需要回答。与其把注意力放在数字革命与计划经济上，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形成数据驱动发展模式所需要的政策与体制创新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新京报》，2017年12月11日）

53.钱颖一：人们应当对不擅长的工作进行调整，学会用人工智能增加效率

人工智能实际上是一个机器算法，特别核心的就是图像识别。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随着技术工具的改变在不断地调整，过去是打算盘。我记得我们以前还用到计算尺，有了计算器就不需要，这部分的功能精力可以放在其他地方。现在人工智能也是一样的，所以必须要做出调整，把注意力转向另外的方面。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人们应当对不擅长的工作进行调整，学会用人工智能增加效率。教育也是如此，这样才可能让教育行业产生更长远、更深刻的变化。——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广播网，2017年12月2日）

54.刘尚希：高成本意味着高风险，要加快改革化解风险

由于经济、社会各种各样风险的扩大，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上升，会使所有实体企业的成本上升，由此进入一个高成本的时代。高成本的时代实际上和高风险的时代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成本不是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而是风险的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么，高成本是无法降下来的。而要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就要加快改革，加快制度的创新，推进制度变迁，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充分发挥制度及时防范化解风险的功能，避免风险累积和集聚。当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程度总体下降的时候，即公共风险呈收敛状态时，经济、社会整体的成本水平才能够下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日报》，2017年12月18日）

55.谢鲁江：中国公有制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开始真正进入资本积累的阶段。即公有制经济不再是依赖来自自身之外的财富的“输血”来发展壮大，而是依靠自己的财富生产和创造能力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资本的积聚扩张，即从依赖外部积累为主转变为依靠内部积累。如，不再依赖于工农产品“剪刀差”来形成企业利润来源，而是主要依靠企业的市场竞争来获取收益。——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导（《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5月上）

56.高培勇：支持实体最要紧的是直接税改革

从2013年到今年，将近四年时间里，我们看到的税收制度改革基本上都发生在间接税上，基本上都是以减税作为基本行动路线。结构性税制改革是一种此减彼增的改革，增的改革没有显现。这几年我们国债的增发、赤字的增列，地方债巨额的发行所带来的风险，等等，都和这些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走的是一条以借钱来支撑税收制度改革的道路。其实在目前的中国只有一件事该做也必须做，那就是加快推进直接税的改革。考虑到中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我们也得从脚下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制、房地产要开征这样一个路子开始起步，从而收获既定的改革目标，同时又不加剧甚至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参考报》，2017年8月30日）

57.樊纲：稳定房价不能要求房价绝对不变

央行货币长效机制还得靠市场，还得坚持市场化的方向，稳定房价不一定房价不变，真正不变的是相对价格，只要房价与收入的比例关系基本稳定，我们住房市场就应该能基本稳定，不能要求房价绝对不变。这一轮房地产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两极分化，大城市价格飙升，三四线小城市库存积压，去库存着重讲的就是去房地产的库存。我们这里说的三四线城市是指偏远地方的人口流失小城市。要从供求双方来理解我们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来寻找所谓的长效机制。住房真正的需求基本是三个部分，不管是买还是租是三个部分：一是所谓刚性需求，刚性需求是人口增长、孩子结婚。二是改善性需求，改善性需求也很重要，现在是幸福生活的需求，特别是城市住房，大家收入提高了需要改善。三是迁移性需求。要在供求两个方面进行调整，长效机制不能只强调一方面，而且不能回到政府大包大揽的老路上，完善房地产市场的制度，使这个市场更加稳定、更加健康地发展，使国人的居住条件变得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目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财网，2017年12月11日）

58.张军：中国经济增长步入“超级城市”时代

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驱动器，大城市、特别是超级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崛起至关重要。固然中国已有常住人口在 2000 万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四个超级大城市，但超级城市的数量与中国的经济和人口规模显得不成比例。为了更多特大城市的发展，中国应放弃限制城市土地开发的配额管理制度。中国试图转向城市引导型增长模式的另一个推进战略是，因势利导大幅度提升城市群在未来经济增长中扮演的主导角色。都市圈的形成能大大提高经济活动的空间密度和获得来自经济互补性的巨大经济效率，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证券报》，2017 年 9 月 15 日）

社会类

59.李玲：医改的核心是改革治理体系

医改的核心是改革治理体系，要落实政府办医责任，协调好领导、保障、管理、监督等各方面的责任，整合医疗卫生各个子系统，把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发挥出来。这包括对医药卫生制度的整体设计、区域医疗资源的规划、医保资金的有效使用、对公立医院的合理投入，对医务人员的正确激励以及对公立医院运行的监管和药品人才保障，等等。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治理权限分割过大，超过 16 个部门有相关职能，但缺乏更高层面的统筹。因此，提升医疗卫生领域治理体系的协同性，是医改必须迈过的关口。——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人民日报》，2017 年 7 月 6 日）

60.翟振武：计划生育政策不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

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验证的普遍规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人口老龄化速度，但也减少了未来老年人口的总体规模，并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老年人口规模处于较高水平的的时间。可以设想，如果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步入老龄社会的时间虽将有所推迟，却会在更长时间里面对更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面临更沉重的养老压力。事实上，我国目前的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正是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出生率时期积累的大规模人口相继步入了老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人民日报》，2017 年 8 月 20 日）

61.李铁：小城镇建设要做好“三防”措施

推进小城镇建设要做好防止房地产热、防止简单复制和防止一窝蜂而上这“三防”措施。

要将小城镇建设与降低成本、疏解大中城市功能紧密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避免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行为。未来应因势利导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激发中小企业的活力，营造特色小镇发展的软环境，最大限度降低市场主体的创新发展成本。——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参考报》，2017年12月18日）

62.青连斌：医养结合之“医”应同医院医疗服务区分开来

医养结合的“医”，应严格同医院的医疗服务区分开来，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养老院内设医院，或医院直接开办养老院。从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来讲，医养结合的主体是卫生和医疗机构，主要是开展社区医疗服务和上门服务，为社区和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医疗服务。但是，从机构养老来讲，医养结合的主体是养老机构，卫生和医疗部门是配角，是配合和支持养老机构开展医养结合、医养融合发展的一方。——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学习时报》，2017年6月19日）

63.丁元竹：互联网推动社会治理从多元迈向N元

社会治理经历了一个认识上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单一治理到多元治理是一个历史性飞跃，在互联网基础上的N元治理更是一个历史性飞跃。原来意义上的多元互动显示的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互联网和在线互动的“朋友圈”使成百上千的人可以同时互动，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互动。一般人们说的多元互动也不过是在街头、会议上的议题讨论，而且这种互动通常需要一定时间的准备，但是，借助互联网平台，人们可以即时互动和N元互动，这是一种虚拟现实中的互动。——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研究员、博导（《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64.王俊秀：警惕老年人陷入“孤岛”

老年人受骗暴露出的除了法治环境、社会治理、养老保障等方面的问题，更暴露出老龄化社会的深层问题，老年人逐渐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多数人在一定意义上生活在被知识鸿沟、媒介鸿沟、信息鸿沟、组织鸿沟和情感鸿沟隔绝的“孤岛”上。为此，政府和全社会要一起行动，努力消除隔绝老年群体的鸿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人民论坛》，2017年6月上）

65.郑功成：社会保障改革要坚持以共享为基石

中国已经确立了共享发展的新理念，这是对以往单纯强调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矫正，更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石。在社会保障改革中，如果动摇共享之根基和互助共济之根本，必定导致制度异化，但若要实现这一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又需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让各方主体参与共建共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社会保障评论》，2017年第1期）

66.张颐武：正视中等收入群体的“无力感”

这些年，中国人生活的中产化大趋势，让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准普遍提升。但这一群体又都处在拼搏上升之中，虽然经济上都已有相对较好的支撑，具备了提升生活水准的基本条件，但也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竭尽全力为自己和家庭的更好生活而奋斗打拼。中等收入群体生活的许多方面都需要社会支撑，需要更多的市场或社会服务，需要高效的法律支持。一旦缺少这些支撑，中等收入群体在遇到问题时就会感到无能为力，从而发现自己生活的“脆弱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环球时报》，2017年12月12日）

67.洪大用：国家治理与贫困治理要协同推进

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影响和制约着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归根结底，贫困是具有社会性的，是社会的产物。解决贫困问题要以优化社会环境为基础和前提。在此意义上，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就不可能有贫困治理现代化。反过来，贫困治理现代化无疑也将直接减轻国家治理的压力，促进和改善国家治理，并在特定方面体现着、丰富着、推动着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光明日报》，2017年10月9日）

68.党国英：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促进二元体制消失

当前，农村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化，从长远看，如果政府继续推进城市化、市场化与农业现代化政策，乡村社会发展随着政府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的推进，二元体制趋于消失。在农业人口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如果我国城乡人口布局有较强的自然演化性质，城乡社会治理的二元机制将失去存在的基础。绝大部分农民有可能在半小时的车程内到达一座城市，享受到城市的各类服务。如果国家面对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趋势，对行政区划体制做出适应性改革和调整，目前绝大部分行政村设置将不再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日

报》，2017年10月9日）

69.彭希哲：错位发展策略可延长各地区“人口红利”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呈现东高西低、城高乡低的特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进一步加剧，老龄化的压力将通过人口流动传导至中西部地区。这将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复杂化，但同时也为东部地区延长了“人口红利”窗口期，创造了政策腾挪空间。利用各地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均可延长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解放日报》，2017年11月20日）

70.迟福林：全国应实行统一的居住证制度

“十三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不应在原有制度上修修补补，不能把“暂住证”换个牌子变成“居住证”，也不能长期实行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双轨制”，而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到2020年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作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取代，中国应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要从中央层面下决心，着力推进居住证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进程和省际间居住证制度的相互衔接，到2020年基本建立以身份证号为唯一标识、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并使人口城镇化率（即居住证率）达到50%以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证券时报》，2017年3月5日）

71.贺丹：积极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

在我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家庭结构变动特点及低生育水平的大背景下，积极建设家庭友好型政策，发挥家庭的政策支点作用尤为重要。积极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第一，要树立家庭优先的价值理念，将家庭利益的审视融入所有经济社会政策。第二，要制定以生育支持、幼儿养育为主体的家庭支持政策，形成家庭友好的制度环境。第三，要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支持女性职业发展，消除女性的后顾之忧。第四，积极倡导代际间交流和互助，促进家庭和谐幸福。第五，要加强社区对家庭的支持，创造家庭友好的社会环境。——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网站，2017年12月8日）

72.朱启臻：乡村振兴的当务之急在于人才

乡村振兴的当务之急在于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一

方面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各级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对农业特点的认识和对乡村发展规律的把握,保障决策不偏离中央乡村振兴的大方向。另一方面,把具有基层“三农”经验的优秀分子选拔到“三农”工作岗位上,避免在乡村振兴实践中走弯路。同时要充分利用、整合“三农”学者的研究成果,吸收其合理成分,为振兴乡村提供理论支撑。——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光明日报》,2017年12月3日)

73.郑风田:城乡融合就是城市与乡村互相吸收对方长处

城乡融合更深的含义是二者更深入地相互吸收对方的优点,并避免不足。城市要吸收乡村的特点有:美景与生态,要环境美,不能都是高楼大厦;同样的道理,乡村也要吸收城市的长处:基础设施要健全,生活要便利化,比如自来水、下水管道、污水处理、网络与无线信号等,都应该与城市一样,银行网点、购物、公共交通等方面也要跟上。城乡融合就是城市与乡村二者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城市要变得更生态、更绿色、更宜居,乡村应该在基础硬件上加大投入,应该更清洁、更便利化、更环保。——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北京日报》,2017年11月20日)

74.张孝德:不能将生态文明简单等同于环境保护和绿化

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政府、企业和社会的角色缺一不可。各级政府一定要转变理念,不能将生态文明简单等同于环境保护、绿化,而要把绿色发展上升到第一要务来抓,在干部考核、制度创新、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每一位官员都要对生态文明建设有足够的认识 and 关注,特别是各地的一把手要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党政同抓的大事,而不只是某个部门的事。——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人民网,2017年10月23日)

75.李立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必须注入“中国特色”

我国大学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中,必须寻求和确立自己的“魂”,把“中国特色”注入到大学建设的“魂”中,体现中国大学的学术自觉和教育自信。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办学理念、发展路径与体制机制等方面,贯穿于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等职能中,也就是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传承中国文化与教育理念。中国的高等教育,根植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中,每一条根脉都接受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滋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1日)

文化类

76.滕文生：人类文明发展需要不断交流、融合与超越

无论东方文明、西方文明还是世界其他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都不断表明，即使一种文明在世界文明的行列中一个时期处于领先地位，对其他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切不可使这种地位和贡献成为包袱，从此孤芳自赏、固步自封，以为不需要向别的文明学习借鉴了；更不能以为自己的文明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从而轻视、鄙薄甚至排斥、打击别的文明，这种认识和做法是自取衰败之道。人类文明发展需要相互不断交流、融合与超越。——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卢德之《论共享文明》代序，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年12月）

77.陈先达：文化的吸取必须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底色

文明可以接受、移用。科技和科技产品，近代的铁路、电话以及一切西方发明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东西都可以进口，也可以借鉴、可以学习、可以仿造。文化则不同。文化不可能简单引入。文化可以交流，可以相互学习，但文化的吸取必须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底色，是吸收而不是被同化。一个民族的文化被同化，表明这个民族之根已枯萎，它必将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新华日报》，2017年7月21日）

78.李德顺：文化上以人为本，当“于细微处见精神”

在文化上以人为本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更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总是可以并应该“于细微处见精神”的。实际上，在每一种文化形式、每一个文化环节、每一项文化工作中，都有一个是否敢于和善于以人的生存发展尺度去衡量和选择的问题。只有做到尊重和理解人的权利与责任，充分信任并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我们的文化建设才能固本强基，获得不尽的资源，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北京日报》，2017年12月4日）

79.韩少功：读经典不是复制知识

饱读诗书如果只是读成个书呆子，读成一部留声机，就不如不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知识都需要用实践来激活，来检验，来消化，来发展创新。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王阳明说：“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根据这种知行观，读书、上课、拿文凭充其量只是一种“半教育”，只有读懂了人生与社会这本“大书”，在生活中尝过酸甜苦辣，才有一个教育过程的相对完整，才能使知识进入我们的血肉，成为真正可靠、可用的滋养与财富。

——中国著名作家（《文汇报》，2017年9月21日）

80.何毅亭：21世纪是中国话语复兴的世纪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也是中国话语复兴的世纪。我们之所以有这个信心和底气，是因为中国的成功实践已经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中国道路不仅很好地解决了中国发展的问题，而且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思路和办法；中国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了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集体自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成为了话语建设的着力点，不再唯西方马首是瞻，不再奉西方话语为圭臬；国际社会前所未有地期待来自中国的声音，愿意下功夫通过掌握中国概念来理解中国逻辑，不再简单地套用西方概念来比附。——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学习时报》，2017年5月29日）

81.张立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的精神价值世界，是真善美的艺术理想世界，它蕴含在世界各文明思想之中。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自古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引领着中华民族对价值理想世界（天下）的憧憬和永恒价值的追求。其表述的话语虽多样而异，但同归而一，形式分殊，其理不二。中国依据天时、地利、人和，化解全球形形色色的冲突和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最佳的天下应对之道，是人类新时代的新创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光明日报》，2017年11月6日）

82.叶小文：文化滋润精神，提升现代人对精神世界的关照

现代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对精神世界的关照却相对滞后，甚至出现了精神上的病态。中华文明积淀了厚重的人文理念，正所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矣”。慎终追远并非要搬出祖先来说事，而是为了以古鉴今、积德厚德，提醒人们在繁忙浮躁的当下想想根、定定神、稳住脚步找到魂。——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人民网，2017年2月17日）

83.陈晓明：把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作为中国文化的立身之本

文化工作者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

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把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作为中国文化的立身之本，我们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就顺理成章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导（《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7日）

84.王岳川：用和谐文化减弱冲突文化的危害

中华文明继续保持可持续的影响力，已然关系到大国文化安全。中国需要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以避免文化冲突升级而导致文化战争，而且东方和谐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丛林法则的战争精神，用和谐文化减弱冲突文化的危害。新的世界格局应该尊重中国在亚洲具有的独特文化意义——东亚的现代性中价值观与信仰、社会机构与语言节日，都意在强调世界需要重视中国声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学习时报》，2017年8月4日）

85.郝立新：核心价值观念是当代中国的精神名片

世界发展新格局和中国地位的有力提升，需要我们展示大国姿态、大国风度、大国形象。中国价值观念是当代中国的精神名片。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既有文明古国的文化底蕴，又有现代文明的精神元素；既传承了泱泱大国的包容风范，又秉持了谦谦君子的典雅风度；既坚持了勇于担当的正义之气，又坚守了关心人类的和平之道。——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光明日报》，2017年10月18日）

86.范玉刚：文化产业能够强化意识形态的时效性和影响的广延性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产业不仅是意识形态传播的基础，而且还能够强化意识形态的时效性和影响的广延性。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强化了意识形态传播的隐蔽性。必须从根本上领会健全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教化有效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是当代文化生产、价值传播的一种主导方式。只有依托健全的文化产业发展体系，才能实现核心价值观传播、消费和弘扬的有效性；也只有在实践中积极健全文化产业发展体系，掌握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才能切实保障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从根本上捍卫国家文化安全并维护文化发展秩序。——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

87.魏鹏举：警惕文化创新中的泡沫

无论政府还是社会，无论精英还是草民，创新是当前各界疾呼的最强音，这几乎没有异议。在发展焦虑与功利浮躁的社会情绪中，战略上的文化创新在短期激发为实践上的创新泡沫，这既反映了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化的典型症候，也可视为创新转型期的必要成本。从文化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的视野来检视，技术性文化创新泡沫、资本性文化创新泡沫和体制性文化创新泡沫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并合理处置。——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人民论坛》，2017年6月下）

88.胡钰：没有技术的文化是边缘的，没有文化的技术是乏味的

科技视角强调运用好新媒介、新技术手段进行文化创新创造。从印刷、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介发展进程看，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会引发更多文化创新创造。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学、网络影视、网络综艺等成为流行的文化形式，网络技术、数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正在成为文化创新创造的重要引擎。实践表明，没有技术的文化是边缘的，没有文化的技术是乏味的。文化与科技结合，能够为文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7日）

89.向勇：审美是文化创意产业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长期以来，人们忽略了产品的审美性、忽略了物品的艺术性，导致许多城市没有自身的特色。现如今很多城市都在打造文化城市、创意城市，但最核心的问题是创意人士是否愿意在这里生活，从而形成创意集聚、创意氛围以及创意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说，审美就是文化创意产业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年1月16日）

90.刘悦笛：“原创”既是自我“创新”，也是自我“创生”

国家大力倡导“创造性转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无论是针对本土传统还是外来资源，这种转化的关键词都是“创造”。有了创造，才有转化；转换成功，就是创造。只有创造了，才是自己的，才可以称之为“原创”。这里的“原创”，起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自我“创新”，二是自我“创生”，前者说的是富有“创造力”的新构，后者是具有“持续力”的拓展，二者缺一不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1日）

来自于海外的 10 个观点

91.古特雷斯：中国减贫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坚持不懈地应对现存挑战，实行包容性发展模式，将能继续减少贫困人口数量，解决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以及东西部沿海地区与内陆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当前正处在实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时期。正确的政策工具和强有力的伙伴关系，能够确保没有人一出生即陷入贫困，确保在更为平等、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当中，人人享有发展机会。期待中国在此方面能持续发挥领导作用。——联合国秘书长（中国扶贫在线网，2017 年 10 月 11 日）

92.海尔马里亚姆：中国发展模式值得全世界学习

我十分坚信，中国将在全球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我们都进入了新时代，但是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适应中国发展的道路。中国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典范，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可以从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学习。中国的发展向来是以人为本的，注重开发人的潜力，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创造有利环境来充分发展经济。这是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够快速摆脱贫困的原因。——埃塞俄比亚总理（《新文阁》，2017 年 10 月 29 日）

93.萨苏：中国共产党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也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能有中国这样伟大的朋友，是一件值得喜悦的事情。中国有句古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一直期待在南北合作框架下能够有更多技术转移，遗憾的是西方国家总是口惠而实不至。但是中国从来都说到做到，主动伸出援手，帮助非洲各国实现自主发展，我们从对华合作中获得的成果是实实在在的。——刚果共和国总统（新华社，2017 年 10 月 11 日）

94.罗思义：研究中国经济让世界读懂新时代的中国

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促使研究中国经济在国外从小众的专业成为最重要且最流行的专业。经济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中国之外，几乎每天都有数百

篇中国经济文章发表，作者包括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果说 25 年前国外研究中国经济属于小众，那么现在则完全成为主流。——英国伦敦经济政策计划署原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 年 12 月 18 日）

95.奥斯卡·克莱伊齐：中国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魔咒

中国的发展可以体现在各个方面。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并且无法替代的部分。近几年中国加大了反腐力度，政府官员提高了纪律性，改善了工作作风，整个社会更加尊重法治。可以说，随着中国等亚洲国家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传统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已被“亚洲中心主义”取代。在过去的后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凭借资本原始积累、技术革命以及文化沙文主义，在国际交往中获得了单方面优势，西方从非对称的国际交易中捞取了巨大的单方面利益。中国主张的包容性的全球化将改变这一不公正国际现象。——捷克考门斯基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主任、教授（人民论坛网，2017 年 9 月 21 日）

96.斯蒂芬·罗奇：中国经济弹性令唱衰者再落空

中国经济在 2017 年初从强劲的周期性复苏中吸取了力量。中国 6 月出口同比增长 11.3%，与前几年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的出口在前几年受到了危机之后全球复苏乏力的负面影响。同样，2017 年上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约 10%，比 6.9%的 GDP 增速高出约 45%，反映了家庭收入的大幅增加和电子商务的强劲势头。长久以来，悲观主义者一直以看待本国经济的方式来看待中国经济，预测人士总是忍不住把受到危机重创的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结局强加到中国头上。这种做法在过去是错误的，现在也同样是错误的。——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参考消息网，2017 年 7 月 27 日）

97.邹至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得益于高素质的人力资本

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不只是因为中国政府采取了明智的政策引入了市场经济，还因为中国具有丰富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其它的国家也采取了市场经济模式，但是他们的发展速度比中国要慢很多，因为他们没有同样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因此，市场经济并不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充分条件，只是必要条件。一个经济体处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的时候，能够快速地发展，甚至赶上别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会放缓，因为中国经济越来越发达，需要取得一个平衡的发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凤凰网，2017 年 11 月 19 日）

98.辜学武：中国国际竞争力日益增长让世界刮目相看

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追求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更公平更民主的社会，而不是盲目追求发展速度的时候，它所引发的世界影响将是巨大的。十九大以后的世界会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对合作发展的渴望；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对携手各国都来“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的诚意。同时，十九大以后的世界也会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强烈的进取精神和日益增长的国际竞争力。他们会感受到，正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变得越来越自信，这些都会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德国波恩大学终身讲座教授（《人民论坛》，2017年11月下）

99.马丁·雅克：中国的发展经验将造福世界

作为一个经济体量上的大国，横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界限之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有一种天然的理解，而这也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十分欠缺的，它们并不能充分地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的问题。中国正在崛起中，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也有着意义不凡的启示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贡献将是最大的，因为它的发展经验将造福世界85%的人口，这是非常重要的。——剑桥大学教授（中国网，2017年10月23日）

100.郑永年：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重塑政党的现代性

十八大以来，执政党通过反腐败来“破除”政党的商业性，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机制规范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行为来重新界定党的现代性。政党就是政治行动的主体，而行动不仅仅是求生存和发展，而是引领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就是说，政党的现代性不是被变化着的环境所被动规定和界定；恰恰相反，执政党要通过行动来主动规定自身的现代性，追求自身的现代性。通过不断更新和规定其现代性，执政党才能在不断更新自身的同时保持其引领社会发展的使命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联合早报》，2017年10月17日）

2017 年理论视野中的 10 大热点

来源：《北京日报》 2017 年 12 月 25 日

编者按 2017 年，国内外形势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从全球看，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走到发展演变的重要关头，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国内看，党的十九大指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方向，中国梦的十三亿践行者由此激发满满的信心和超强的动力。这里谨从我国理论学术界关心和热议较多的话题中选取十个方面，略作梳理和概述，以期为读者展现当今中国发展及世界变化的状态与趋势。

1. 人工智能：中国抢先布局，有望与美国并驾齐驱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化，做大做强产业集群。“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全国政府工作报告。

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逐渐改变了生产工具，提高了生产效率，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一是成为新竞争力的来源，使采用该技术的企业能够获得竞争壁垒进而收获超额价值；二是通过加快数据传播的效率、提炼信息的内涵以及降低信息不对称，使采用该技术的企业以更低的交易成本获得更多的差价。人工智能在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诸如对就业的影响以及在技术应用过程中涉及的安全、伦理和监管方面的问题。未来受人工智能冲击最大的行业将是制造业、教育、医疗和金融。

学者指出，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各国纷纷加紧了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以抢占未来竞争的高地，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研究人类大脑原理，从中获得启示而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二是人工智能技术具体的发展目标和战略规划。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有很多优势：首先，中国拥有庞大而活跃的市场，其规模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其次，与西方高福利国家相比，中国人民拥有“白+黑”“5+2”的勤劳品质；再次，中国科研队伍强大、研究水平较高；最后，中国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人工智能研发基础，走在世界前列。随着以上优势的发挥，中国有很大可能与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并驾齐驱。

2. 脱贫攻坚战：激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3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人大四川代表团审议时说：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我们党立下的军令状。3月至9月，全国各地统一开展建档立卡动态调整，把符合标准的贫困人口以及返贫人口全部纳入。

学者强调，要打赢脱贫攻坚战，不仅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凝心聚力，投入大量的资金、物资等，为贫困群众“输血”，解决迫切的生产生活之需，增加获得感，而且更要注重有针对性地扶志与扶智，激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扶志就是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帮助贫困群众树立起摆脱困境的斗志和勇气；扶智就是扶知识、扶技术、扶思路，帮助和指导贫困群众着力提升脱贫致富的综合素质。只有外部“输血”式扶贫与内部“造血”式脱贫相结合，通过自身“造血”巩固“输血”的成果，才能彻底拔除穷根、消除贫困。

学者指出，脱贫攻坚战在具体实践中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硬骨头”还没有完全精准瞄准；二是工作中仍存在不严不实不精准问题，主要表现是脱贫计划脱离实际，有的地方把脱贫工作“数字化”“文件化”“会议化”“表格化”，有的甚至在考核评估中弄虚作假；三是扶贫资金使用管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四是部分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有的地方为图省事、赶进度，大包大揽、送钱送物，“干部干、群众看”，造成养懒汉现象。这些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并作出政策回应。

学者建议，进一步瞄准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因病致贫贫困户，加大对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支持力度。抓好考核，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纠正不严不实不精准的问题，特别要纠正形式主义，严防弄虚作假。通过教育培训等措施，增强基层扶贫干部“绣花”能力，提高贫困识别、帮扶、退出精准度，切实做到十九大报告要求的“脱真贫、真脱贫”。

3. 雄安新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千年大计

4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学者认为，雄安新区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较理想的集中承接地。从地理位置看，它与北京、天津正好形成等边三角形，可以与周边几个大城市形成半小时通勤圈。新区地处华北平原和湖泊湿地，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此外，新区所涉及的三县人口密度低、开发程度低，发展空间充裕，如同一张白纸，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是从实际出发，经过科学研究、反复比较、严格论证后做出的现实选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学者指出，建设雄安新区的过程中应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围绕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有目的、

有选择地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二是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三是要采取多方面的综合措施解决好职住平衡问题；四是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地把可持续性贯彻落实到规划建设的全成员、全要素、全过程中去。中央对雄安新区的定位强调“创新发展”，要建成“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创新发展既是雄安新区的核心任务，也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

4.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破解“修昔底德陷阱”指明人间正道

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提出，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9月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厦门宣言中号召，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12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强调，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

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思想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单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是通过共同挑战、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把世界各国团结在一起，是国与国之间以共同利益为最大公约数化解矛盾、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随着中国外交实践的丰富而不断深化和凝练，涵盖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三个层面，强调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与蓝图，而且着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用实际行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学者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破解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指明了人间正道。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沉溺于过时的国际秩序，用历史上的只言片语预测中美关系难以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对中国发展充满疑虑。这是错误的，也是没有必要的。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向国际社会有力证明，中美关系并不存在所谓的“陷阱”，合作共赢才是大国相处之道。

5. 十九大：进入新时代，形成新思想，提出新方略，开启新征程

10月18日至24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十九大确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并将其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这次大会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

学者指出，十九大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述，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思想——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新方略——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14 条基本方略；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学者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科学内涵，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治国理政新境界、管党治党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战略定力，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八个明确”提纲挈领地指明了新思想的主要内容，构成了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科学体系；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并概括为“十四个坚持”，既是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新思想的实践要求。

学者认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的是由较低层级供需矛盾向中高层级供需矛盾的转变，从“数量短缺型”供需矛盾向“优质不足型”供需矛盾转变。我国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突出体现在农村，因此在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化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一家一户经营的小农户在中国社会中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消失。

国外学者认为，十九大是中国共产党一次具有“全球意义”的代表大会，影响着世界，中国将全球发展与内部发展联系起来，将变成拉动世界经济的“牵引船”。十九大报告不仅是中共的行动纲领，也应成为国际社会改革发展和反腐的“参考书”，值得世界各国仔细揣摩学习。人民总是被放在第一位，这一点在报告中体现得非常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源自始终坚持从人民的角度出发，准确把握国家和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和任务，并提出科学的解决方案。

6. 监察体制改革：确立中国特色监察体系的创制之举

11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学者指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全国推开，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基于试点工作在北京市、山西省和浙江省稳步推进的实践成效上作出的重要决定。监察体制改革是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深刻改革，涉及政治权力、政治体制、政治关系的重大调整。从政治权力看，改革前，行政监察机关隶属于各级人民政府、履行行政监察职能，主要是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改革后，监察机关从人民政府中分离出来，专司国家监察职责。从政治体制看，监察委员会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同级党委、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上一级纪委监委负责，必将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拓宽人民监督权力的路径，使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机关既分工负责又协作配合的制度更加完备。从政治关系看，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有利于强化党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充分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确立中国特色监察体系的创制之举，监察委员会实质上就是反腐败工作机构，和纪委合署办公，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是政治机关，不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

学者强调，监察委员会也应接受来自各方的监督：首先是自我监督，通过监察权行使过程中的实体和程序规范实施监督，比如监察法规定留置时长，要求留置期间全程录音录像，且监察委内部设有监督机构等；其次，监察委员会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之间相互制约和监督，是加强权力监督的重要方式；再次是来自人大的监督；最后，社会监督也很重要。

7. 美丽中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绿色革命

11月27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短板。12月5日，在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获2017年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

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理念和价值取向，体现了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我们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我们党和政府从小处着手投资公共厕所，是帮助人民追求更美好生活目标的具体做法，也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提升。“厕所革命”不仅让广大游客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成为推动整个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的重要切入口，也让

“美丽中国”形象深入人心。塞罕坝林场建设者的故事证明，退化了的環境是可以被修复的，这证明了中國的环保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印证了我们黨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行之有效。世界开始重视中國各地正在进行的环保工作以及“美丽中国”理念，在环保领域，中國这样的大國提供了世界急需的领导力。

学者指出，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首次把“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报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心在和谐，核心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通过现代化的绿色产业体系实现国民经济的绿色化。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一种绿色发展理念，更是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一场绿色革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为此，要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发展方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口，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推进产业生态化改造，开辟生态产业的新路径，将绿色生态科技成果转化作为生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在节能环保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生态环境、社会管理等方面广泛实施生态科技项目，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要以融合发展方式，发展生产、生活、生态有机融合的业态。突出绿色金融在推动绿色发展中的血液作用，以资本为纽带、以资产化为方法、以资本化为杠杆，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建设，实现绿色发展。

8. 纠正“四风”：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017年12月4日是“八项规定”出台5周年。12月1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重要指示：“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学者指出，党内存在的作风不纯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不想”的思想基础仍不够牢靠；压力传导存在逐级递减，上热中温下冷、水流不到头的现象仍然存在；不收敛不收手情况仍然存在，“四风”问题呈现隐形变异；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仍然突出，需要着力破题整治；有的制度修订完善不及时，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执行不到位。这些都说明黨的作风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纠正“四风”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是在新起点上的再部署、再出发，是深化作风建设的动员令，是我们今后一段时期驰而不息纠正“四风”的重要遵循。当前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把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作为治理重点，综合施策，以重点问题的突破带动整体工作推进：一是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二是强化主体责任落实；三是

从具体问题抓起；四是严格监督执纪问责。抓作风建设，关键在党员领导干部，要通过抓“关键少数”，让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

9. 住房制度改革：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12月18日至2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研究部署贯彻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的经济工作，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学者认为，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这将促使住房回归居住属性，是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建立住房发展长效机制的出发点，其必经之途包括：首先要适度降低商品住房供应占整个住房供应体系比重，改变商品住房一枝独大的局面。这正是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同时也是住房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内涵。一是需要鼓励支持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创新商品住房之外的住房供给渠道，如北京等地的共有产权住房实验等均属此类探索；二是完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明确地方政府对本地基本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担负主体责任，同时鼓励企业、用人单位、村集体等社会各方面利用各自资源积极参与住房保障建设；三是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这需要全面推进租购同权，立法保护租房家庭的权益，支持住房长期租赁企业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同时辅以相应的税收优惠和土地政策便利。其次要适度降低商品住房的金融属性。如通过坚持和改进限购、限贷等需求抑制政策，支持真实需求、控制投机炒作。限购、限贷等政策不能单纯理解为临时性市场调节手段，它们同时也是保证住房回归居住属性的基本性政策制度。

学者指出，2018年我国将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出台更多配套政策和调控措施。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以土地、住房的供给端改革，税收、信贷的配套政策改革，养老、医疗、教育等资源分配改革为着力点。同时继续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

10. 逆全球化潮流：暴露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和困境

2017年的世界政坛，出现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月宣布美国退出TPP，6月宣布退出《巴黎协定》，1月、3月、9月连续颁布限制移民政策，12月通过了史上最大的税收减免法案、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英国于3月正式启动“脱欧”进程，12月与欧

盟就脱欧达成初步协议；在荷兰、法国、奥地利、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的选举中，“反欧”“疑欧”民粹政党强势崛起。

学者认为，“逆全球化”潮流暴露了西方国家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现实以及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一批“反建制”政治家的执政纲领集中表现为强调民族主义，关注本国事务，强调本国优先。在西方很多人看来，一些人扯起保护主义的大旗，高喊反对全球化的口号，甚至到处寻找替罪羊，无端指责发展较快的国家，目的是掩盖国内经济发展和利益分配存在的问题，把民众注意力从国内引向国外。这种变动，也反映出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出现了从未遇到过的系统性危机。“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本是西方世界推动全球化所信奉和推崇的两个支柱，如今却发生了动摇。“自由经济”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和贫富两极分化，让曾经的中产阶级感到失望；“民主政治”则为少数主流精英所操控和利用，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到厌倦和丧失信心。在民粹主义裹挟下，公投和大选被当作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也表明企图“终结历史”的西方民主政治并不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唯一选择。

学者认为，从长期来看，全球化是大势，逆全球化只是现象。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发表的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表达了全球化的中国观和中国立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合作共赢才是正确选择。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国际合作，也愿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公共产品。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引领国际机制的改革和国际新规则的制定，勇于承担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大国责任。未来，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将是崛起中国对世界的新的贡献。